

## 第三章 環境系絡因素與選民因素

職業運動競賽常會出現「主場優勢」一詞，用來形容地主隊享有「天時」、「地利」、「人和」等競賽場外的環境優勢。同樣地，當一場選舉競爭的社會氛圍有利於參選的一方時，他方想要力挽狂瀾逆勢操作成功並不容易，其間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是構成選舉期間社會氛圍的兩個主要因素，決定了那個政黨的候選人擁有地主隊的主場優勢。

環境系絡因素是指長期存在的國內外結構性因素，或選戰期間國內外突發性的重大事件，設定並影響了選民對選舉議題重要性順序的認知，選民並據以評估各主要政黨在重要議題的相關立場。為此，環境系絡因素讓處於不同議題位置的政黨候選人，因選民議題立場的分布曲線而居於有利或不利的地位。

選民因素是指既有選民的人口組成結構，政黨認同及相關議題立場傾向的分布情況，具體表現在社會分歧和政治分歧內容，同時也反映在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和黨派投票行為上。為此，既有的社會分歧和政治分歧內容可將選民區隔成具有不同黨派投票取向的集群，選民既有的黨派投票行為的傾向和分布比率，則構成各政黨或候選人在競選活動展開前的基本盤面。

因此，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構成選戰的實際空間模型內容，包含重要的議題面向、政黨議題位置的分布情況、選民議題立場的分布情況，以及選民黨派投票傾向的分布情況等。候選人即因所屬政黨的空間位置差異及基本盤的大小不同，而具有相對優勢或弱勢的選戰起跑點，同時候選人的競選行為也受到所屬政黨的議題位置及基本支持者的制約。本章即是透過李、連參選時的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的比較，看李、連是否面對相近似的實際空間模型內容，進一步釐清影響兩人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及競選策略選擇差異的關鍵因素所在。

### 第一節 環境系絡因素的比較

經檢視九〇年代台灣選民議題投票的研究發現，統獨議題和安改議題是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顯著議題，顯示統獨議題和安改議題具備了吸引較多媒體注意和選民討論，以及容易被一般社會大眾所理解的「簡單議題」屬性，而成爲選民區隔政黨屬性定位的主要議題，同時也是影響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顯著變項。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對選民統獨立場的測量，除使用「統獨立場六分類」的傳統名義量尺外，自一九九三年起也開始使用單面向量尺（由 0 到 10）來詢問受訪者本身及其對各主要政黨在統獨議題位置的認知。<sup>1</sup>

---

<sup>1</sup>問卷題目如下：「我們社會中，有人主張台灣應該盡快宣布獨立；也有人主張兩岸應該盡快統一。如果主張台灣應該盡快宣布獨立的看法在一邊，用 0 表示；主張盡快統一的看法在另一邊，用

## 壹、九 年代選民與政黨的統獨位置分布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統獨議題位置的調查結果如表 3-1 所示，國內選民本身的統獨立場位置是在 5.0 至 5.6 之間浮動，顯示出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情況相當穩定，一直採取「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相對地，選民眼中的國民黨是「中間偏統」的政黨，統獨位置是在 6.1 至 6.8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的統獨位置在 1.0 至 1.5 個刻度間；而民進黨則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統獨位置在 1.9 至 3.2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的統獨位置在 2.1 至 3.4 個刻度間；而新黨在一九九六年之後，是一個比國民黨更「傾向統一」的政黨，統獨位置在 6.5 和 7.2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統獨位置在 0.9 至 2.2 個刻度之間。

表 3-1：選民與國內各主要政黨的統獨位置（平均數）

年度	民進黨	選民	國民黨	新黨
1994	2.2 (-3.4)	5.6	6.8 (1.2)	6.5 (0.9)
1996	1.9 (-3.2)	5.1	6.1 (1.0)	6.5 (1.4)
1998	2.3 (-2.7)	5.0	6.5 (1.5)	7.2 (2.2)
2000	3.2 (-2.1)	5.3	6.4 (1.1)	7.2 (1.9)
平均	<b>2.40</b>	<b>5.25</b>	<b>6.45</b>	<b>6.85</b>

註：(數字)是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刻度距離，正負值代表方向。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從九〇年代國內主要政黨在統獨議題的空間位置分布情形，顯現選民認知的國民黨統獨立場，是比民、新兩黨更接近於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而選民對民進黨的台獨政黨定位是國民黨打「恐獨安定牌」的利基所在，也造成民進黨在九〇年代立委選票成長的瓶頸。<sup>2</sup>顯示民進黨在兩岸的統獨議題面臨較大的趨中化調整壓力，並具體表現在民進黨內台獨論述的轉化。<sup>3</sup>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選民對民進黨統獨位置的認知逐漸發生了變化，民進黨持續地向選民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趨近，彼此的空間距離由一九九四年的 3.4 個刻度，一九九六年的 3.2 個刻度，逐步縮減至一九九八年的 2.7 個刻度，二〇〇〇年的 2.1 個刻度，顯示選民認知中的民進黨是一個越來越不趨於極端的台獨政黨。相對地，選民認知的新黨則是一個日益傾向主張統一的政黨，新黨的統獨位置由原先的 6.5 移至 7.2，不但沒有向選民的維持現狀立場趨近，反而距離選民的立場越來越遠，彼此的空間距離由一九九四年的 0.9 個刻度，一九九六年的 1.4 個刻度，逐步擴增至一九九八年的 2.2 個刻度，二〇〇〇年的 1.9 個刻度。

10 表示。那麼，請問您的位置比較靠哪裡？您看國民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民進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新黨比較靠哪裡？」

<sup>2</sup> 雖然民進黨在九 〇 年代縣市長選舉的政黨得票屢創新高，並在 1997 年縣市長選舉政黨得票率首次超越國民黨，但立委選舉的政黨得票率則一直維持在三成左右，進入民進黨成立以來政黨得票成長的高原期，一直苦於無法跨越三成得票率的門檻。

<sup>3</sup> 關於民進黨內台獨論述的轉化過程可以參閱（郭正亮，1998）。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選民本身及其認知的國民黨及民進黨的統獨位置，在一九九六年都出現了遠離統一的現象，選民的統獨立場由 5.6 變成 5.1；國民黨也由 6.8 往中間 6.1 的位置移動；民進黨則由 2.2 往更左邊的 1.9 位置移動。顯然，這與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以來兩岸關係即陷入持續緊張對立有關，而一九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共把飛彈打到基隆和高雄的外海，更讓台灣感受到中共的敵意，刺激台灣民眾在統獨立場更往拒絕統一的方向移動。

雖然九〇年代選民對國內主要政黨的統獨位置認知出現了上述變化，但是選民和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彼此之間的相對空間位置，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就一直維持沒變。特別是選民、國民黨、民進黨三者的相對空間位置，更是自一九九四年以後就沒有改變過。選民眼中的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新黨，一直是一個傾向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而新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兩岸統一的政黨；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及新黨，則一直是中間偏統的政黨；選民則傾向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並一直位居民進黨和國民黨統獨立場的中間並較靠近國民黨的位置。

上述政黨統獨立場的相對空間分佈情況，說明了國民黨在統獨議題的相對選舉優勢所在，以及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根本性原因。特別是一九九八年陳水扁挾高施政滿意度尋求連任台北市長失敗，更加突顯台獨因素是構成民進黨候選人在重要行政首長選舉尋求勝選的主要障礙，同時也預示一九九九年用來修正民進黨台獨黨綱之「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出現與通過。<sup>4</sup>然而，相對於民進黨為擴張選民支持基礎，而在統獨議題向維持現狀的中間立場調整趨近，新黨反而表現出為鞏固統派基本選民，而在統獨議題上採取更加退縮和保守的統一立場。

### 一、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曲線

由於單一面向量尺的統獨立場測量因受訪者心中各有一把尺的主觀因素影響，同樣是「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立場的受訪者，可能分別給自己 6、7、8 不同的分數。相對地，傳統的統獨立場六分類測量選項清楚不會產生受訪者心中各有一把尺的問題，同時可以瞭解不同統獨立場的選民人數分布比，並且調查資料累積也多，可與單一面向量尺測量的調查發現作相互驗證。<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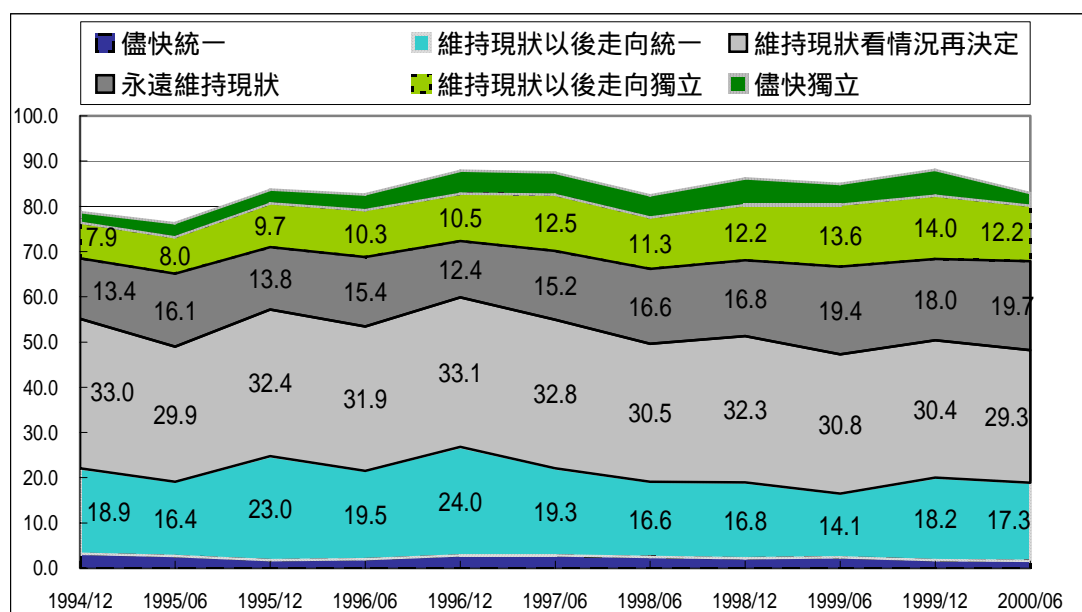
圖 3-1 是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對九〇年代台灣選民統獨立場六分類的調查結果，顯示選民在統獨立場主張「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三

<sup>4</sup>陳水扁的文宣大將羅文嘉表示在 1998 年市長敗選的檢討會議中，民進黨各派系要角首度出現「輸在兩岸議題」的高度共識，連向來捍衛台獨黨綱不遺餘力的新潮流系也認為，陳水扁失利的主因絕對不是政績不佳，而是中間選民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始終存有高度疑慮（張俊雄等編，2000：23）。

<sup>5</sup>統獨立場六分類題型如下：「關於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社會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1、儘快統一；2、儘快獨立；3、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成至三成三之間上下浮動，同時也是最多數選民所秉持的統獨立場。若加入抽樣誤差的考量，顯現歷次調查主張「維持現狀看情況再決定」的選民人數是相當穩定的。另外，主張「永遠維持現狀」的比率則一直維持在一成二至二成間，並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如果將前述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狹義維持現狀者」，則台灣選民主張「狹義維持現狀」的人數一直維持在四成五至五成之間，反映出選民主張維持現狀的統獨主流立場。

圖 3-1：九〇年代台灣選民統獨立場分布圖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 [www2.nccu.edu.tw/~s00/database/data0406\\_3.htm](http://www2.nccu.edu.tw/~s00/database/data0406_3.htm) )

其次，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選民，自一九九六年以後呈現下滑的趨勢在一成九和一成四之間浮動。相對地，主張「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選民人數，則由一九九四年的 7.8% 上升到一九九九年的 14.0%，呈現逐年緩步上升的趨勢。若將前述兩類選民與之前的「狹義維持現狀」者合計並稱之為「廣義的維持現狀者」，則台灣選民主張「廣義的維持現狀」一直維持在七成至八成間，涵蓋了絕大多數台灣選民的統獨立場主張。

最後，主張「儘快統一」或「儘快獨立」的極端統獨立場選民，則分別維持在 6% 以下。若將主張「儘快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這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傾向統一者」，則「傾向統一」的選民一直維持在一成七到二成七之間波動。相對地，若將主張「儘快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這兩類選民合計並稱之為「傾向獨立者」，則「傾向獨立」的選民則從一成逐步上升至兩成。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選民自一九九六年以後主張「永遠維持現狀」，以及「傾向獨立」的人數都有逐年緩步上升的趨勢，符合一九九六年單一面向量尺的選民

統獨立場調查發現，顯示一九九六年的台海飛彈危機確實激化了部分台灣選民對中國大陸的負面觀感，而傾向主張台灣不與中國大陸統一的統獨立場。再者，傳統統獨六分類的調查結果，顯示「維持現狀」仍是台灣選民統獨立場的主流，其與單一向度的統獨位置調查結果也相一致。

整體而言，九〇年代台灣選民的統獨立場分布曲線，仍維持相當穩定的狀態，「維持現狀」依舊是絕大多數人的務實選擇，認為台灣沒有宣布獨立的必要，同時也不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為此，統獨立場相對趨於極端的民進黨和新黨如果想擴張政治版圖，就必須掌握台灣多數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並向「維持現狀」的統獨立場修正靠攏。

## 二、兩國論與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

台灣過去的戒嚴體制是延續國共內戰體制，撤退來台國民黨統治當局仍視大陸為中華民國的「淪陷區」，並稱居住在大陸淪陷區的人為「大陸同胞」。然而，隨著兩岸長期的分隔分治，以及統治權力結構伴隨著台灣內部民主轉化而逐漸本土化的趨勢，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認同內涵乃逐漸增長，同時也造成島內「中國認同」和「台灣認同」的國家認同分歧。在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提出兩國論主張後，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曾以「政治社群感」(sense of political community)來測量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分別詢問受訪者「我國」所指涉的領土範圍，以及「我國人民」所指涉的人口範圍。

表 3-2、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類型

	台灣人	台灣人+大陸人	無反應	合計
<b>台灣</b>	<b>第一類型</b>	<b>第三類型</b>		
次數	734	81	35	850
整體百分比	67.5%	7.5%	3.2%	78.2%
<b>台灣+大陸</b>	<b>第三類型</b>	<b>第二類型</b>		
次數	38	83	8	129
整體百分比	3.5%	7.6%	0.7%	11.9%
<b>無反應</b>				
次數	22	12	75	109
整體百分比	2.0%	1.0%	6.9%	10.0%
<b>合計</b>				
次數	793	177	117	1087
整體百分比	73.0%	16.2%	10.8%	1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民眾對「兩國論」與兩岸關係的意見調查。

表 3-2 領土範圍和人口範圍兩個變項交叉分析發現，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基本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台灣認同類型」，認為「我國」就是單指台

灣，而「我國人民」就是單指台灣的人，並不包括中國大陸及其人民，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67.5%；第二種類型是「大中國認同類型」，認為「我國」指的是台灣與大陸，「我國人民」同時包含台灣人與大陸人，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7.6%；第三種類型是「混淆類型」，認為「我國」是單指台灣，但「我國人民」則同時包含台灣人和大陸人，或者認為「我國」包括台灣和大陸，但「我國人民」單指台灣人不包括大陸人，這些人占受訪人數的 11.0%。

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有三分之二的人具有明確的台灣認同內涵，認為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相對，選民中具有明確大中國認同內涵的人不到一成，若將具有部分中國認同內涵的混淆型合併計入，則選民具有大中國認同內涵的人則約有二成左右。顯現出李登輝總統的兩國論主張是符合絕大多數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內涵，但是基於不惹惱中共對台動武的現實考量，有七成多的人在統獨議題上主張維持現狀，並拒絕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sup>6</sup>因此，如果說絕大多數選民主張維持現狀的統獨立場，是迫使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壓力，那麼絕大多數選民的台灣國家認同內涵，則是鼓勵民進黨內進行台獨論述轉化的誘因，這也說明了為何民進黨在統獨立場的調整是比新黨來得積極和有效。

## 貳、九 年代選民與政黨的安改位置分布

俗話說：「當家的，不鬧事」。如果「安定」、「執政經驗豐富」是執政黨必然的選舉訴求，那麼「改革」、「換人做做看」則是在野政黨的基本訴求。這是政黨的競爭位置決定了競選訴求內容的具體事例，特別是在國民黨長期執政之下，在野黨自然會以「政黨輪替」、「換黨執政」來進行改革訴求。除此之外，台灣歷經二次大戰的戰火洗禮，兩岸長期的軍事和政治對峙，以及威權當局的長期危機思想灌輸，台灣社會是充滿高度危機意識的社會，選民表現出對社會安定感的強烈需求。因此，安定與改革成為國內選舉重要議題是相當合理而且可以預期的事。

然而，九〇年代台灣選民在安改議題立場是否隨著民主改革的進程而有所改變？選民對各政黨在安改議題的立場認知又是如何？根據表 3-3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對國內選民歷年的安改議題立場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在安改議題立場明顯傾向安定，四次調查的平均數據都在 7.0 和 7.2 之間，認為社會安定最重要，追求改革不應影響社會安定，顯現出相對保守的心態及對社會安定感有著強烈的需求，因而一般選民即使贊成改革也是以社會要安定不能亂作為前提。<sup>7</sup>

<sup>6</sup>根據陸委會自一九九四年至二〇〇〇年間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以台灣地區（不包含金門、馬祖）二十歲以上成人為母體，採取分層分段等機率抽樣設計所進行的五次「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面訪調查，國內選民對於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表示「不贊成」的人，一直維持在七成三至七成八之間。

<sup>7</sup>安改議題的題型內容為「就整個台灣的發展來看，有人認為大幅改革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犧牲一點社會安定也是值得的；有人則強調安定最重要，追求改革不應影響社會安定。假定認為大幅改革重要的看法在一端用 0 代表；強調安定重要的看法在一端用 10 代表請問您的位置比較靠哪裡？您看國民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民進黨比較靠哪裡？您看新黨比較靠哪裡？」。

表 3-3：選民與國內各主要政黨的安改位置（平均數）

年度	民進黨	新黨	國民黨	選民
1994	3.3 (-3.8)	4.7 (-2.4)	7.1 (0.0)	7.1
1996	3.8 (-3.2)	5.6 (-1.4)	6.8 (-0.2)	7.0
1998	4.0 (-3.2)	5.1 (-2.1)	6.5 (-0.7)	7.2
2000	4.4 (-2.8)	5.6 (-1.6)	7.0 (-0.2)	7.2
平均	<b>3.88</b>	<b>5.25</b>	<b>6.85</b>	<b>7.12</b>

註：(數字)是政黨與選民之間的刻度距離，正負值代表方向。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其次，選民眼中的國民黨是一個重視社會安定的政黨，國民黨的安改位置是在 6.5 至 7.1 之間浮動，是最接近選民立場的一個政黨，幾乎與選民的安改位置相重疊。相對地，在選民眼中的民進黨則是一個重視社會改革而犧牲社會安定的政黨，民進黨的安改位置在 3.3 和 4.4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安改位置達 2.8 個到 3.8 個刻度，是距離選民安定立場最遠的政黨。至於選民眼中新黨是一個兼顧安定和改革的政黨，安改位置是界於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而在 4.7 至 5.6 之間浮動，距離選民安改位置達 1.6 到 2.4 個刻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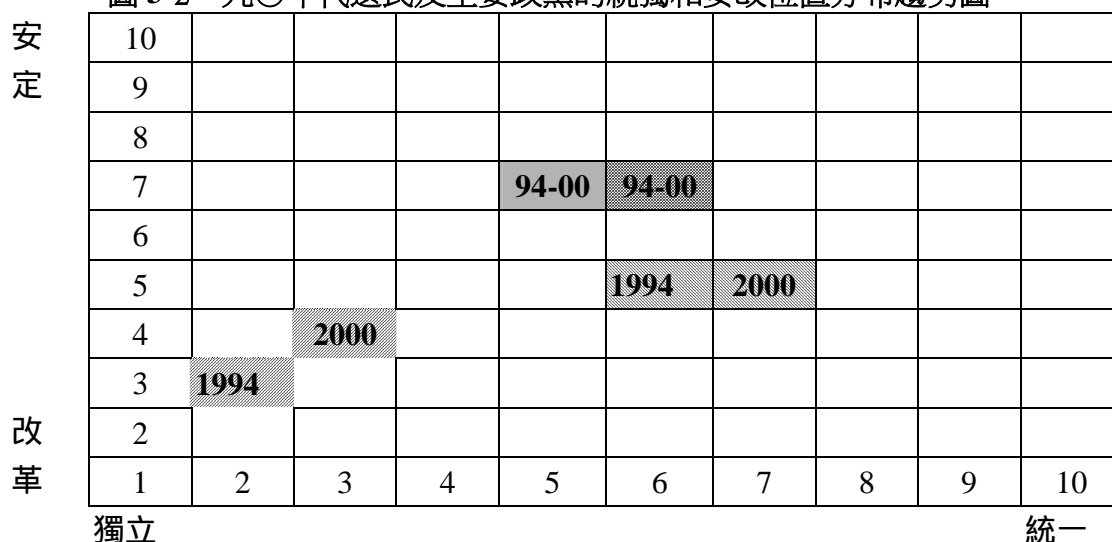
顯然，台灣選民對社會安定感的強烈需求是相當有利於執政黨的安定訴求，這是國民黨長期以「恐獨安定牌」作為選舉利器的社會基礎之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選民眼中的民進黨是越來越務實化而逐漸縮小與選民的立場差距，彼此的立場差距由一九九四年的 3.8 個刻度逐漸縮減為二〇〇〇年的 2.8 個刻度。換言之，民進黨不論在統獨或安改議題的立場主張都朝主流民意的方向修正靠近，而逐漸改變民進黨過去給人的台獨黨、暴力黨的刻板形象。





但即使如此，選民對民進黨的認知仍處在「量變」階段，並不足以構成「質變」，就如同選民、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統獨議題的相對空間位置沒有改變一樣，在安改議題的相對空間位置也沒有改變，選民認知中的民進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新黨，一直是傾向主張改革而犧牲社會安定的政黨；而新黨相對於國民黨及民進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改革和安定兼顧的政黨；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相對於民進黨及新黨，則是一直傾向主張改革不能影響社會安定的政黨；選民則一直是採取最保守的立場，也一直和國民黨的立場最接近，認為改革不能影響社會安定。

### 參、小結

根據九〇年代選民對其本身及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統獨和安改議題位置的認知，並依據時間序列組成一個二維的統獨和安改位置分布趨勢圖，從圖 3-2 首先可以發現，國內選民眼中的民進黨不論在統獨或安改立場，都向選民位置趨近了一個刻度，顯示選民對民進黨是台獨黨、暴力黨的刻板印象已經有所改變；而選民眼中的新黨在統獨立場越發顯得「親中傾統」，與選民位置的距離增加 1 個刻度。兩相比較之下，民進黨顯得較具自信心與擴展力量，願意為拓展中間選票而進行台獨論述的轉變，即使面對新國家連線成員的出走和建國黨搶食台獨基本教義派選票；相對地，新黨則顯得退卻和內縮，只想消極鞏固核心支持者而變得更保守，而距離台灣認同、維持現狀的主流民意立場越來越遠。

圖 3-2：九〇年代選民及主要政黨的統獨和安改位置分布趨勢圖



註：  民進黨  選民  國民黨  新黨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其次，選民眼中的國民黨及選民自身的議題位置都沒有明顯改變，這也是九〇年代在新國民黨連線自國民黨出走組成新黨之後，國民黨仍能在全面選舉競爭之下贏得選舉保有執政權的重要原因。雖然，民進黨在統獨和安改議題立場都有出現趨中化的現象，但是選民、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相對空間位置仍然沒有改變。國民黨的空間位置仍與選民最為接近，在統獨位置仍然居民進黨和新黨的中間；民進黨仍位在圖的左下方；而新黨仍舊在圖中間偏右的位置。

據此，連戰二〇〇〇年參選時所處的環境系絡因素，與李登輝一九九六年參選時並無明顯不同，特別是國民黨和選民的空間位置都沒有明顯改變，國民黨仍享有在統獨和安改議題的主場優勢。



## 第二節 選民因素的比較

學者對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投入及努力，無非試圖回答下列三個問題：第一是為何有的選民去投票，有的選民沒去投票？第二是為何出席投票的選民，有些人投某甲候選人，有些選民投某乙候選人？第三是為何某甲候選人以壓倒性多數或些微票數險勝，而不是某乙候選人？同樣的，對任何參選的候選人而言，其最關心的三個問題不外乎，第一是誰會出來投票？第二是有多少人會投我一票？第三是這些人基於何種理由而投我一票？候選人唯有掌握上述問題的正確答案才能找到目標選民的所在，並擬訂競選策略及分配有限競選資源。

顯然政治學者在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所要尋找的解答，同時也是候選人所急欲知曉的答案，因而決定或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因素，同時也是形塑政黨或候選人競選行為的因素所在。本節擬對九〇年代影響國內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因素進行審視，比較李登輝和連戰所面對的選民因素是否不同。

### 壹、九 年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

選舉結果是加總出席投票選民的抉擇來決定的，這樣的說法符合一般的認知，但並不完整，因為忽略了部分選民的不投票行為對選舉結果產生的間接影響。對擁有選舉投票權的所有合格選民而言，整個投票抉擇流程共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要不要去投票？如果決定不要去投票，則抉擇流程終止；如果決定要去投票，則進入第二階段，要投給誰？因此，選舉結果不單是出席投票者所決定的，而是由不投票選民與投票選民所共同決定的。

雖然，隨著財產權、種族、性別、年齡等選民資格限制條件的解除或放寬，選舉權的普遍化已經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共同特徵，但現代民主國的投票率並未隨著選舉權的擴張而成同比率的增加，反而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在投票當天選擇從事其他的活動，投票率的滑落已經成為當前先進民主國的普遍現象，部分人士甚至擔心過低的投票率會傷害到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sup>8</sup>

如果選民的不投票行為是隨機發生的，那麼對政治學者或候選人而言，選民出不出席投票都無關緊要了。如果選民的不投票行為不是隨機發生的，那麼找出有效區隔投票選民和不投票選民的變項，不論就選民投票行為理論建構的完整

---

<sup>8</sup>以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為例，雖然美國總統一職被稱為世界最有權力的職位，但是大約有一半美國選民在總統選舉投票選擇缺席，對該由誰來出任這世界最有權力職位似乎並不怎麼在意。根據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統計，除了在一九六一年創63%投票率的歷史新高記錄，往後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就開始逐屆下滑，一九七二年的投票率為55%，一九八八年達歷史的新低點，投票率只稍微過半，直到一九九二年才打住不再下滑。因此，當有一半的美國選民選擇不去投票時，就有越來越多的學術單位、政黨、候選人想要了解，到底是哪些人？基於哪些原因？而不去投票。

性，或對候選人競選策略的擬訂及競選資源分配而言，都有理論建構和實務應用的必要性存在。不過，顯然選民的不投票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否則這個題目就沒有討論的必要，學術界對選民投票行為的比較研究發現，投票選民與不投票選民在人口學變項及政治心理變項都有顯著的差異性存在，而選舉的投票成本、選舉的重要性、選舉的激烈程度等也會影響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

### 一、人口學變項的影響

就影響選民不投票行為的人口學變項而言，相當多的經驗研究指出選民的年齡和社經背景會影響投票意願。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高的選民有較高的投票率，且明顯高於社經地位較低的選民，不論是以選民的教育程度、收入或職業來作為選民社經地位的操作指標，其研究發現都是一致且具有長期的穩定性（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 Miller & Shanks, 1996:56; Shields & Goidel, 1997）。但如果個別比較教育程度、收入、職業等變項對選民出席投票機率的獨立影響力時，則發現教育程度對出席投票機率具有最大的影響力，且教育程度的影響力具有長期性的作用（Miller & Shanks, 1996:84）。

其次，研究發現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social involvement）高低，也會影響其投票機率的高低，當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越高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越高（Morton, 1991; Peterson, 1992; Knack, 1992; Sheng, 1994: 226; Miller & Shanks, 1996:103）。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指標通常是由多元指標所組成的，詢問受訪選民是否擁有自己的住宅、在目前的住宅居住幾年、在當地社區居住幾年、是否已婚、是否每個禮拜上教堂等等。如果選民回答的正面答案次數越多，數字越大，則代表這個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越深，促使其出席投票的人際影響機會越多，因而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比較高。

第三，研究發現選民的年齡和出身世代也會影響其投票意願的高低，新生世代選民的投票率明顯偏低。美國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研究發現，雖然就所有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來看，高教育程度、高社會涉入程度者的投票比率，仍明顯高於低教育程度、低社會涉入程度者。不過，在控制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等變項之下，就不同世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來看，「後新政世代」（Post-New Deal）年輕選民的投票比率，仍明顯低於「前新政世代」（Pre-New Deal）及「新政世代」（New Deal）（Miller & Shanks, 1996）。<sup>9</sup>顯示美國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投票率的持續下降，主要是因選民人口的自然世代交替，以及新生世代選民偏低的投票率所造成的。

---

<sup>9</sup> 根據 Miller 與 Shanks 的定義，「前新政世代」是指在 1932 年以前便具有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新政世代」則指在 1932 年和 1964 年間取得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後新政世代」則指在 1964 年以後取得總統選舉投票權的選民。

## 二、政治心理變項的影響

就影響選民投票機率的<sup>1</sup>政治心理變項方面而言，是以選民對政治的興趣、政黨認同感、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等，作為主要中介變項來探討這些變項對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影響。多數的研究發現選民對政治興趣越高，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越高，即使在控制選民相關的背景屬性之後，其關聯性依然顯著（Rosenstone & Hansen, 1993）。因為對政治越感到有興趣者越可能參與競選活動、關心選舉結果，並透過大眾媒體蒐集相當訊息，這些因素讓他們暴露於來自大眾媒體、政黨或候選人的選舉動員而越有可能出席投票。

其次，政黨認同感、候選人評價、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度較高的選民，其投票參與的機率也比較高；相對地，無特定政黨認同、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其出席投票的機率明顯偏低，即使在控制選民的教育程度與世代變項之後，上述變項與選民投票參與行為之間的關係仍然相當穩定（Campbell et al., 1960; Almond & Verba, 1963; Abramson, 1983; Miller & Shanks, 1996: 111）。因為具有強烈政黨認同者或對候選人有明顯喜惡評價者，通常都會關注選舉結果如何而有較強烈出席投票的動機；而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感較高者對既有的政治體系抱持較正面的態度，信任政府且認為政府會回應他的需求而有較高的政治參與動機，其出席投票的機率也比較高；而公民責任感高者視投票為公民應盡的義務，其出席投票的可能性也比較高。相對地，無特定政黨認同、政治效能感低、政治信任感低、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通常是對政治抱持較為疏離態度的人，對政治沒有興趣也沒有涉獵相關資訊，其投票參與的機率也就偏低。

## 三、投票成本效益變項的影響

從理性抉擇理論的基本論點來看，選民出席投票機率是其投票效用期望值減去投票成本的函數，選民出席投票與否是理性計算之後的結果，當選民投票支持某候選人當選而獲得的效用期望值大於投票成本時（淨收益為正），理性自利的選民便會出席投票；當效用期望值小於投票成本（淨收益為負），理性自利選民不會作賠本的生意，自然不會出席投票。因此，就各別選舉的投票成本、重要性以及競爭激烈程度而言，如果選民出席投票成本低、選舉的重要性高、選舉競爭激烈，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會較高；相對地，如果出席投票成本高、選舉結果無關輕重、選情呈現一面倒，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會偏低（Milbrath & Goel, 1977; Campbell, 1993; Endersby et al, 2002: 610-631）。

$$F( ) = b \times p \text{ (效用期望值)} - C \text{ (投票成本)}$$

據此，理性選民的投票參與機率大小（F 值）是以上列等式來表示，當選舉的重要性越大，代表選舉結果對選民影響的效用越大（b 值越大）；而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越高，每一張票成為影響選舉結果之關鍵選票的機率也就越高（p 值

越大)。因此，當選舉越重大且競爭越激烈所帶給選民的效用期望值也就越高；相對地，選舉結果無關緊要（ $b$  值越小）且選情呈現一面倒（ $p$  值越小），其帶給選民的效用期望值也就越低。

在效用期望值決定之後，投票成本（ $c$ ）大小就成為決定投票參與機率的關鍵因素，投票成本越低（ $c$  值越小）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越高，投票成本越高（ $c$  值越大）則選民出席投票的機率越低。就投票當天影響選民完成投票行為所需成本的因素相當多，除完成投票行為所需付出的機會成本之外，還包括花費的時間成本、交通成本，其中選舉法規是影響選民投票成本的主要因素，類似選民登記制、在籍投票等限制性規範越多，選民負擔的投票成本也越高。如果選民的投票成本是固定的，那麼選舉結果影響越重大、選舉競爭越激烈，選民的效用期望值越高，則選民的投票機率自然越高。

從投票成本效益的角度可以解釋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相關研究發現內容，例如社會的優勢族群及對既有的政治體系保持正面看法者，他們投票行為所帶來的效用期望值較大，因而出席投票的機率也就明顯高於效用期望值較小的弱勢族群及政治疏離者。其次，因為選舉法規的修改往往涉及政治利益的重分配，導致既有選舉法規的修改不易獲得朝野的同意，就單一國家而言選民在不同選舉的投票成本可視為固定，因而選舉的重要性和競爭的激烈程度，就成為影響投票率高低的關鍵因素。

#### 四、台灣選民不投票行為的檢視

從台灣歷次選舉的總體投票資料分析發現，在類似縣市議員的地方基層選舉，長期以來農業縣分選民的投票率都要比省轄市來得高，只有在縣市長等較重要職位的公職選舉，彼此的選民投票率才會相互接近。雖然都市化選區選民的學歷相對較高，但鄉村選區選民的社會涉入程度較高，社經地位因素對選民不投票行為影響可能因此被弱化，例如在鄉村選區有較高比率的低學歷、高年齡及從事農林漁牧一級產業的選民，在地方派系透過農會系統及社會關係網絡進行選舉動員而出現高投票率現象。

其次，選民對政治不感興趣而不去投票的原因，可能因本身知識能力不足以處理相關的政治訊息所導致，也有可能因資訊充分及參與後的失望所導致，若不加以區分就可能扭曲教育程度變項對不投票行為的解釋力。例如在解嚴之後隨著國內政黨選舉競爭的制度和激烈化，縣市地方政府換黨執政的經驗越來越普遍，同時越發突顯政客、政黨及官僚組織等政治部門都有其自我利益，政治部門的自我利益取向並不因換黨執政而有立即明顯的改變，類似政商勾結的金權政治問題依然存在，政府部門濫權貪污的醜聞仍時有所聞。因此，訊息管道多元資訊充分的高教育程度選民，其暴露在相關負面訊息下的機會越多，越容易傾向認為朝野政客同為一丘之貉，政黨和政府越來越無法反應社會的需求和期待，導致高教育程度選民對政治感到疏離，反而投票意願不高。

爲此，上述國外選民不投票行爲的研究發現，是否適用於國內選民的投票抉擇行爲是存有相當的疑問的，還有賴於針對我國選民投票抉擇行爲的經驗性調查加以檢證。其次，相對於歐美民主先進國家的低投票率現象，國內選民的投票率向來比較高，相較於一般選民投票行爲的研究，選民不投票行爲的研究往往較不受重視，探討台灣選民不投票行爲的經驗研究，目前僅有蔡佳泓和楊夢麗兩篇發表在《選舉研究》期刊上具代表性的研究論文。

蔡佳泓使用對數成敗比的多變項統計模型 (Logit Model)，對一九九四年省長選舉及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投票參與行爲進行分析，發現選民的性別、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治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及對候選人的評價等變項，是顯著影響選民投票參與行爲的重要因素。如果選民對候選人偏好明顯、社會涉入程度深、選舉涉入程度深、政黨認同度高、女性的選民，其前往投票的機率越高；相對地，對候選人沒有偏好、社會涉入程度低、選舉涉入程度低、無政黨認同、男性、年齡越輕，則其前往投票的機率越低。而其他如政治效能感、教育程度等變項，雖然具有提高模型解釋力的作用，但都不具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尤其是教育變項的影響方向是與國外的研發發現相反，顯示國內選民教育程度低者投票率偏高，而教育程度高者的投票率反而偏低 (Tsai, 2001: 125-58)。

楊夢麗則使用多層線性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根據受訪者過去六次選舉的投票參與行爲調查 (包括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二〇〇一年縣市長選舉及立委選舉)，研究發現選民的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政治興趣，是影響選民投票參與行爲的顯著變項，如果選民的年齡越大、社會涉入越深、政黨認同越強、政治興趣越高，則越能明顯降低選民的不投票的比率，是與國外的研究發現相一致。其次，選民的教育程度越高則不投票的比率越高，而選民的職業與家庭收入則與其投票參與行爲沒有顯著關係存在，同時政治效能感對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爲也沒有影響，則是與國外研究發現不一致的地方 (楊夢麗，2003: 159-91)

蔡、楊二文分別運用不同公職選舉的調查資料和研究統計方法，對九〇年代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爲進行研究，都得到極爲近似的研究發現並具體描繪出不投票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如年輕、高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程度不深、無政黨認同、對候選人沒有明顯偏好、對政治不感興趣者。但上述調查研究發現是比較投票者和沒投票者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的差異，並沒有將受訪者不去投票的原因納入分析，因而無法處理類似投票成本對選民參與行爲的影響。因此，本文擬進一步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資料進行驗證，以掌握九〇年代中後期不投票選民的特徵和不投票的理由。

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八年兩次立委選舉，以及一九九六年、二〇〇〇兩次總統選舉的選民投票行爲調查，都曾詢問不投票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發現國內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基本可歸爲三類 (見表 3-4)：第一類是基

於投票成本效益原因，例如沒空、當兵、要工作、出國、上課、不在選區、大勢底定不差我一票，有七成五左右的人是基於投票成本效益而不去投票<sup>10</sup>；第二類是對政治感到失望而衍生出的疏離感，例如沒有理想的候選人、誰當選都與我無關、不苟同選舉，有二成的人是基於政治疏離原因而不去投票；第三類是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例如對候選人都不認識、忘記去投票、選舉太複雜了，有不到一成的人是基於相關資訊不足而不去投票。

**表 3-4：選民不投票原因的次數分布**

	投票成本效益 原因	政治疏離 原因	相關資訊不足 原因	合計
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	71.4% ( 119 )	24.3% ( 41 )	4.3% ( 7 )	100.0% ( 167 )
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	80.6% ( 82 )	15.6% ( 16 )	3.9% ( 4 )	100.0% ( 102 )
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	73.0% ( 102 )	19.3% ( 27 )	7.7% ( 11 )	100.0% ( 139 )
二 年總統選舉	74.8% ( 60 )	15.9% ( 13 )	9.3% ( 7 )	100.0% ( 81 )
<b>平均</b>	<b>75.6%</b>	<b>18.8%</b>	<b>6.3%</b>	<b>100.0%</b>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如果將政治疏離和缺乏相關資訊都視為選民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反應，那麼對政治不感興趣只能解釋選民不投票行為的 25% 左右；相對地，投票的成本效益才是影響台灣選民不投票的主要因素，其中選罷法有關在籍投票的規定則是造成選民投票成本大增的根本原因。不過，選民不投票的原因很可能是多重的，單選的問卷設計可能忽略選民不投票行為的複雜性。台灣大學「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曾對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選民不投票原因採取複選的問卷設計，調查分析結果可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分析結果相對照。

根據表 3-5 台大的調查資料顯示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同樣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有關投票成本與效益的因素，例如工作太忙（33.3%）、人不在戶籍所在地（23.2%）、不投也不會影響選舉結果（11.6%）、生病行動不便（7.1%）、找不到身分證（1.5%），合計有 76.7% 的不去投票者是因上述原因而沒有投票。第二類是對政治失望而產生疏離感的因素，例如沒有理想的候選人（22.7%）、對政治感到失望（17.2%）、對政黨表現感到失望（12.6%），合計有 52.5% 的不去投票者因這些理由而不去投票。第三類是欠缺相關政治資訊的因素，例如對政治不感興趣（14.6%）、對候選人不了解（13.6%）、忘記去投票（2.5%）、沒人來拜託（1.5%）等，合計有 32.2% 的不去投票者是因此而不去投票。

<sup>10</sup> 現行選罷法的條文規定選民必須以其戶籍所在地之投票所進行投票，因工作、服役、就學或其他種種因素，無法於投票日當天返回戶籍地投票者就喪失了基本的參政權。根據內政部相關統計資料估計，全國有約 15% 的人「現在住所」與「戶籍所在地」不符。因此，職業工作關係、人不在戶籍所在地，成為選民沒有去投票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政府修改選罷法增訂不在籍投票規定，應對提升投票率具有相當大的幫助。

顯然，單就選民不去投票的理由分布來看，投票成本因素依舊是導致國內選民不去投票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對政治失望而產生疏離感，最後才是欠缺相關政治資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沒去投票的受訪者提到了政治疏離的原因，顯示除在籍投票規定提高投票成本之外，因政治疏離感而降低的投票效用期望值，也是影響選民不投票的重要因素之一。

**表 3-5：選民不去投票原因次數分配（可複選）**

原因項目	次數分配	百分比
工作太忙	66	33.3%
人不在戶籍所在地	46	23.2%
沒有理想候選人	45	22.7%
對政治感到失望	34	17.2%
對政治不感興趣	29	14.6%
對候選人不夠了解	27	13.6%
對政黨表現感到失望	25	12.6%
不投也不會影響選舉結果	23	11.6%
身體不舒服或行動不便	14	7.1%
忘了去投票	5	2.5%
沒有人來拜託我	3	1.5%
臨時找不到身分證	3	1.5%
其他	21	10.6%
合 計	341	172.2%

資料來源：台大選舉行為研究室，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1998）立法委員的選舉。

但是，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不投票選民是否會因年齡和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不投票理由。<sup>11</sup>表 3-6 的交叉分析數據顯示，不同年齡的選民是有不同的不投票理由，其中「投票成本」是 29 歲以下、50 歲以上選民不投票的主要原因，顯現投票成本與選民年齡呈現 U 形的曲線關係，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的選民可能會有不同的投票成本內容，例如年青人的投票成本可能來自機會成本，如果去投票的話，那麼去投票的時間就不能拿來玩；老年人的投票成本可能來自交通成本，類似生病、行動不便、沒有人載等。

其次，「政治疏離」則是 30 至 49 歲者不去投票的主要因素，顯示對中壯年的不投票選民而言，其對政黨和政治人物可能有過「歷經千帆皆不是」的失落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20 至 29 歲的新生世代不投票選民，有 56.63% 的人是

<sup>11</sup> 由於受訪者中表示沒去投票的有 201 人，而具體回答不去投票理由的有 196 人，同樣面臨樣本數過少的問題，因而分析所得結果可能意義不大。但是台大這份調查資料是目前所有調查資料中，沒去投票個案數最多且採取複選式的問卷設計，應該可以作為試探性研究的資料，並來與參與投票行為研究發現相對照。

因「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是各年齡層所占比率最高的，顯示國內年輕世代選民自始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比率可能不低，是導致年輕選民投票率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 3-6：不同年齡層選民的不投票理由**

年齡	原因	成本效益	政治疏離	欠缺資訊	其他
20-29		73.5%	53.0%	56.6%	10.8%
30-39		61.8%	63.6%	38.2%	14.6%
40-49		47.4%	57.9%	36.8%	10.5%
50-59		75.0%	25.0%	12.5%	0.0%
60 以上		78.6%	7.1%	28.6%	0.0%

資料來源：台大選舉行為研究室，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1998)立法委員的選舉。

其次，分析不同教育程度之不投票選民的不投票理由，有著不同於年齡分析的發現，表 3-7 的交叉分析數據顯示，「投票成本」是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不投票的主要理由；「政治疏離」則是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不投票的主要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者有越高比率是因對政治疏離而不去投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專科以上教育程度因「欠缺相關資訊」而不去投票的比率，也明顯高於專科以下教育程度者，顯示教育程度並不構成台灣選民取得相關政治資訊的門檻，而高教育程度的不投票選民之所以欠缺相關資訊，可能是因對政治的失望而不願意再接觸相關的政治訊息所致。

**表 3-7：不同教育程度選民之不投票理由**

學歷	原因	成本效益	政治疏離	欠缺資訊	其他
小學及以下		79.5%	15.4%	25.6%	2.6%
國、初中		58.1%	48.8%	32.6%	16.3%
高中、職		60.9%	50.0%	32.6%	15.2%
專科		65.4%	61.5%	76.9%	3.9%
大學及以上		63.6%	88.6%	63.6%	11.4%

資料來源：台大選舉行為研究室，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1998)立法委員的選舉。

## 五、相關研究發現的再檢驗

除了解選民不去投票的原因外，不去投票選民是否有如蔡楊二人研究所發現的內容，根據表 3-8 對選民的人口學變項和政治心理變項進行卡方檢驗，發現選民的年齡、教育程度、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度、公民責任感等變項，與不投票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相對地，選民的性別、省籍、家庭收入、職業、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等變項，則與其不投票行為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存在。其



中選民的年齡、社會涉入程度、政黨認同、公民責任感等變項，其關係方向與國內外的研究發現相一致，亦即 20 至 29 歲年青選民、社會涉入程度低者（未婚、居住未滿 20 年、沒有參加社團）、無政黨認同者、公民責任感低的選民，其不投票的百分比明顯偏高；相對地，50 歲以上、社會涉入程度高者（已婚、世居當地或在當地居住滿 20 年以上、有參加社團）、強烈政黨認同者、公民責任感高者，其不投票百分比明顯偏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程度變項雖與選民投票與否有顯著相關，但關係方向卻與國外的研究發現呈現相反，高教育程度的不投票比率明顯偏高，而低教育程度的不投票比率明顯偏低。其次，國內選民的職業、家庭收入等社經地位因素與選民投票參與行為都不具顯著的相關性，除職業為學生者因教育程度變項的介入使得投票比率明顯偏低之外，其他職業選民並沒有明顯的偏高或偏低的現象。最後，國內選民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雖然普遍偏低，但是選民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的高低也都不影響投票參與行為。

## 貳、九〇年代台灣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

九〇年代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歷程變遷最快速的十年，不論從民主的轉型、憲政體制的修改及政黨體系的變遷，都呈現出新興民主國家尚未制度化的不確定性。面對如此快速變化的政治生態環境，影響國內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的主要變項是什麼？國內的政治分歧結構和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在前後兩次總統選舉是否出現明顯的差異變化？李連參選時所面對的選民因素是否有明顯的不同？這些問題都待釐清。

自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脫離國民黨組成新黨以來，台灣共歷經一九九四年的省市長選舉、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一九九七年縣市長選舉、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及北高市長選舉等重要的公職選舉。由於新黨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行政首長公職選舉，往往因政黨實力和人才的不足而無法推出有效候選人參選。因此，複數選區單記投票不可讓渡制的半比例代表制立法委員選舉，反而較能夠反映出國內各主要政黨的實力及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傾向。

另外，國內的政黨競爭體系由過去國民兩黨競爭走向多黨競爭，過去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研究基於選民對國、民兩黨的態度、印象與偏好呈現兩極化的現象，而符合單面向的「敵對性假設」的測量方法已經不再適用，代之而起的是多面向測量方式。<sup>12</sup>為此，擬以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後所進行的面訪調查資料，對當時國內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進行分析，比較李、連參選前所面臨選民因素的異同。

<sup>12</sup> 關於多黨體制下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方法的討論，請參閱（何思因、吳釗燮，1996：1-16）。

表 3-8：選民人口特徵、政治心理變項與投票參與行為的交叉分析

	有投票	沒投票	無反應	回答人數
性別				
男	84.3%	15.2%	0.6%	100.0% ( 693 )
女	84.8%	14.2%	1.1%	100.0% ( 664 )
年齡				
20-29	74.0%	25.1%	0.9%	100.0% ( 331 )
30-39	83.1%	16.3%	0.6%	100.0% ( 338 )
40-49	86.6%	12.8%	0.7%	100.0% ( 298 )
50-59	93.8%	5.0%	1.3%	100.0% ( 160 )
60 以上	93.0%	6.1%	0.9%	100.0% ( 230 )
省籍				
本省閩南	83.8%	15.2%	0.9%	100.0% ( 959 )
本省客家	84.7%	14.8%	0.5%	100.0% ( 203 )
大陸各省	87.9%	11.5%	0.6%	100.0% ( 174 )
原住民	85.7%	14.3%	0.0%	100.0% ( 14 )
無反應	100.0%	0.0%	0.0%	100.0% ( 7 )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89.5%	9.7%	0.7%	100.0% ( 401 )
國、初中	78.1%	21.4%	0.5%	100.0% ( 201 )
高、中職	86.9%	12.0%	1.0%	100.0% ( 383 )
專科	85.6%	12.9%	1.5%	100.0% ( 202 )
大學及以上	73.2%	26.8%	0.0%	100.0% ( 164 )
無反應	100.0%	0.0%	0.0%	100.0% ( 5 )
職業				
企業主	91.4%	8.6%	0.0%	100.0% ( 81 )
專業經理人	87.2%	12.8%	0.0%	100.0% ( 133 )
一般白領	85.0%	14.4%	0.6%	100.0% ( 180 )
自僱工作者	87.7%	10.7%	1.6%	100.0% ( 187 )
一般藍領	82.9%	16.0%	1.1%	100.0% ( 281 )
軍公教	81.5%	17.4%	1.1%	100.0% ( 92 )
學生	60.0%	40.0%	0.0%	100.0% ( 35 )
家管	90.0%	10.0%	0.0%	100.0% ( 30 )
其他	84.3%	14.8%	0.9%	100.0% ( 338 )
家庭月收入				
4 萬以下	85.2%	13.1%	1.7%	100.0% ( 290 )
4 萬至 8 萬	85.1%	14.6%	0.3%	100.0% ( 396 )
8 萬以上	84.8%	14.9%	0.3%	100.0% ( 303 )
無反應	83.4%	15.5%	1.1%	100.0% ( 367 )
社會涉入度				
高	93.8%	6.2%	0.0%	100.0% ( 178 )
中	88.0%	11.3%	0.7%	100.0% ( 548 )
低	81.2%	17.6%	1.3%	100.0% ( 547 )
無反應	65.1%	34.9%	0.0%	100.0% ( 83 )
政黨認同度				
強烈	92.6%	7.1%	0.3%	100.0% ( 310 )
普通	85.1%	14.0%	0.9%	100.0% ( 437 )
沒有	80.6%	18.5%	0.9%	100.0% ( 556 )
無反應	74.5%	23.6%	1.8%	100.0% ( 55 )
政治效能感				
高	85.8%	13.5%	0.6%	100.0% ( 155 )
中	85.9%	13.4%	0.7%	100.0% ( 440 )
低	83.2%	16.2%	0.6%	100.0% ( 673 )
無反應	85.4%	11.2%	3.4%	100.0% ( 89 )
政治信任感				
高	83.8%	16.3%	0.0%	100.0% ( 80 )
中	84.4%	14.5%	1.1%	100.0% ( 469 )
低	85.1%	14.5%	0.4%	100.0% ( 723 )
無反應	82.1%	14.3%	3.6%	100.0% ( 84 )
公民責任感				
高	91.4%	8.4%	0.1%	100.0% ( 841 )
中	78.0%	20.1%	2.0%	100.0% ( 254 )
低	66.2%	33.3%	0.5%	100.0% ( 195 )
無反應	76.1%	17.9%	6.0%	100.0% ( 67 )
合計	84.5% ( 1147 )	14.7% ( 199 )	0.8% ( 11 )	100.0% ( 1357 )

註：“ ”表示 adj 2，所占比率顯著偏高；“ ”表示 adj -2，所占比率顯著偏低。

資料來源：台大選舉行為研究室，投票行為與選舉實務的評估：第四屆（1998）立法委員的選舉。

## 一、1992 年立委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

陳義彥教授首開風氣之先以集群分析法納入影響選民投票行為的變項，將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的選民區隔成不同政治屬性的選民集群，探討不同集群選民是否具有不同的黨派投票傾向，並檢視影響國內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顯著變項。由於當時新國民黨連線尚未組成新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選民相關政黨態度的測量方式，仍延續國、民兩黨的單一面向「敵對性假設」，不過在黨派投票行為變項則有增列新國民黨連線的選項，因而對一九九三年新黨成立後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分析仍具參考價值。

陳教授根據國內選民投票行為研究成果的累積，歸納出影響國內選民投票行為的多個主要變項，將選民對國、民兩黨形象之差異、兩黨評價之差異、政黨偏好、對國民黨表現之評價、兩黨候選人的形象差距、統獨立場、族群意識、省籍等八個變項納入，對受訪選民進行集群分析並與選民實際黨派投票行為（投給國民黨提名者、新國民黨連線者、民進黨者、其他黨團者）進行交叉分析，檢視集群的選民成分與其黨派投票行為的符合情形，以確定各選民集群分類的有效性。透過上述八個變項將選民區有效隔成四個選民集群，且以選民所屬的集群與其黨派投票行為進行交叉分析，發現不同集群選民的屬性與其黨派投票行為傾向具有高度的符合性（陳義彥，1994：19-24）。<sup>13</sup>

第一集群的選民人數最多，占受訪選民人數的 35.2%。從該集群選民在八個變項的平均數值來看，顯示該集群選民並沒有特定的政黨偏好傾向，統獨立場略傾向台獨，省籍幾乎都是屬於本省人，族群意識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顯現該集群選民是屬於無特定政黨認同及統獨議題立場持維持現狀中間立場的游離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46.8% 的人是投給國民黨，33.5% 投給民進黨，11.8% 投給新國民黨連線，7.9% 投給其他黨團者。因此，第一集群選民基本可稱為傾本土的游離選民集群。

第二集群的選民人數占受訪選民的 17.1%。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集群的政黨傾向較偏向民進黨，統獨立場傾向台獨，絕大多數都是本省人，族群意識較傾向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顯現該集群的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相當接近民進黨的認同者，而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86.6% 是投票給民進黨，8.2% 投給國民黨，3.0% 投給其他黨團，2.2% 投給新國民黨連線。因此，第二集群基本是民進黨的核心支持者，可以稱之為民進黨選民集群。

---

<sup>13</sup>陳義彥教授為進一步確定這八個變項是否能對選民進行有效的區隔，達成同集群內選民的同質高（組內均方值低），不同集群選民間的異質高（組間均方值高）的有效區隔目的，乃以這八個變項來對四個選民集群進行變異數分析，發現八個變項的 F 值檢定都達統計顯著水準，證實這八個變項確實能將選民區隔成四個不同屬性的選民集群。

第三群集人數次多占受訪選民的 33.3%。該群集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群集成員的政黨傾向較偏向國民黨，統獨立場較傾向主張維持現狀，省籍上清一色為本省人，在族群意識上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該群集選民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符合社會一般對國民黨選民的認知，而反映在黨派投票傾向有 80.2%的人投給國民黨，8.7%投給新國民黨連線，5.9%投給其他黨團，5.1%投給民進黨。因此，該群集是國民黨的核心支持者，基本上可稱為國民黨選民群集。

第四群集人數最少，占受訪的 14.4%。根據該群集在八個變項上的平均數值顯示，該群集在政黨傾向偏向國民黨，在統獨立場上傾向中國統一，清一色是外省人，族群意識有較強烈認同是「中國人」。顯現該群集選民成分是對映於國民黨黃復興成員和眷村選民的政治態度傾向，而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傾向上，這群集選民有 79.3%投給國民黨，19.8%是投給新國民黨連線，幾乎沒有人投給民進黨或其他黨團。因此，該群集基本上可稱為中國意識選民群集。

**表 3-9：四個選民群集中心之相對位置**

	第一群集	第二群集	第三群集	第四群集
省籍	-.364	-.301	-.379	2.640
族群意識	-.036	-.687	.085	1.245
統獨立場	-.037	-.217	.460	.690
兩黨形象之差異	-.278	-1.125	.659	.727
兩黨評價之差異	-.308	-1.253	.829	.859
政黨偏好	-.252	-1.329	.676	.938
對國民黨表現之評價	-.285	-.710	.583	.214
兩黨候選人形象之差異	.027	-1.353	.278	.582
人數	401	195	379	164
百分比	35.2%	17.1%	33.3%	14.4%

註：群集中心位置即為群集所屬個案標準分數的平均數，絕對數值越大表示位置越極端，偏好越明顯；絕對數值越小表示位置越中間，偏好越不明顯。正值越大表示外省籍本省選民越多、族群意識傾中國、統獨立場傾統、政黨偏好國民黨；相對負值越大則代表本省籍選民越多、族群意識傾台灣，統獨立場傾獨、政黨偏好民進黨。

資料來源：陳義彥，1994：20。

表 3-10 的交叉分析顯示個別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國民黨的選票有五成來自第國民黨選民群集，而各有二成四來自游離選民群集和中國意識選民群集；民進黨有近六成選票自來自民進黨選民群集，三成四來自游離選民群集，而來自第國民黨和中國意識選民群集合計不到一成，民進黨仍舊是外省籍選民的拒絕往來戶；新國民黨連線的選票各有三成多選票分別來自中國意識、游離選民及國民黨選民群集，但極少選票是來自民進黨選民群集，也突顯民進黨認同者對新國民黨連線的拒斥。

**表 3-10：四個選民集群之黨派投票行為交叉分析（1992 立委選舉）**

	國民黨	新國民黨連線	民進黨	其他	合計
游離選民集群					203
橫列百分比	46.8%	11.8%	33.5%	7.9%	100.0%
直行百分比	23.5%	32.9%	34.3%	45.7%	28.6%
民進黨選民集群					134
橫列百分比	8.2%	2.2%	86.6%	3.0%	100.0%
直行百分比	2.7%	4.1%	58.6%	11.4%	18.8%
國民黨選民集群					253
橫列百分比	80.2%	8.7%	5.1%	5.9%	100.0%
直行百分比	50.1%	30.1	6.6%	42.9%	35.6%
中國意識選民集群					121
橫列百分比	79.3%	19.8%	.8%	.0%	100.0%
直行百分比	23.7%	32.9%	.5%	.0%	17.0%
合計	405	73	198	35	711
橫列百分比	57.0%	10.3%	27.8%	4.9%	100.0%

卡方值 = 372.51 df=9 p < .001

資料來源：陳義彥，1994：26。

選民的集群分析及黨派投票行為傾向顯示，民進黨選民集群與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無論在省籍背景、族群意識、統獨立場、政黨認同傾向，均呈現全面性對立。其次，選民人數最多、沒有特定黨派傾向、統獨立場傾向維持現狀的游離選民集群則是游離選票的所在，也是各政黨的兵家必爭之地。<sup>14</sup>第三，一九九三年新黨成立造成政黨重組的效應，主要是發生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國民黨有相當部分的外省籍選民轉向支持新黨。

## 二、1995 立委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

民進黨和新黨提出的「三黨不過半」訴求是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選舉訴求，同樣地，有關選民政黨態度的測量方式也改採三向度的調查測量方式，分別詢問受訪選民對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評價和印象。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調查資料，對選民進行集群分析發現選民的省籍、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三黨的評價、喜惡、印象等十二個變項，分別通過變異數分析的 F 值檢定（附錄一），並能有效將受訪選民區隔成四個集群（表 3-11），且不同集群選民具有不同的黨派投票傾向（表 3-12）：

<sup>14</sup>游離選民集群的主要人口特徵為本省籍、40 歲以下、男女各半，而選民投票行為調查中出現的未表態者，有 46.3% 歸屬於游離選民集群（陳義彥，1994：26）。對照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研究發現，游離選民集群的投票率很可能明顯偏低，選舉期間投票傾向調查的未表態率則明顯偏高。

表 3-11：一九九五年立委選舉四個選民集群中心的相對位置

變項	第一集群	第二集群	第三集群	第四集群
省籍	-.215	-.323	.197	.874
族群意識	-.133	-.480	.322	.577
統獨立場	-.195	-.416	.560	.803
對國民黨的評價	-.108	-.368	.964	-.498
對民進黨的評價	-.038	1.416	-.421	-.401
對新黨的評價	-.143	-.150	-.358	1.364
喜不喜歡國民黨	.029	-1.007	.911	-.732
喜不喜歡民進黨	.350	.634	-.738	-1.030
喜不喜歡新黨	.187	-1.014	-.441	1.010
對國民黨的印象	.051	-.605	.883	-.845
對民進黨的印象	.363	.712	-.807	-.917
對新黨的印象	.026	-.695	-.136	.885
人數	560	138	221	142
百分比	52.8	13.0	20.8	13.4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研究：從八十四年立委選舉探討。

第一集群人數最多，占受訪選民的 52.8%。該集群絕大部分是由本省籍選民所組成（本省籍選民占 93.0%），族群意識是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向「台灣人」方向傾斜，統獨立場是由「維持現狀」向「主張台獨」方向傾斜，對三黨的評價都有些微的負面評價傾向，但對民進黨的負面評價最低；較喜歡民進黨，其次是新黨，最後是國民黨；給予民進黨正面的印象，對新黨和國民黨則為中性偏正面的印象。該集群的人口特徵和政治態度傾向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56.6% 投票給國民黨，35.0% 投給民進黨，4.8% 投給其他黨籍或無黨籍候選人，只有 3.5% 投給新黨，顯示該集群是屬於游離選民集群，也是國、民兩黨打選戰的兵家必爭之地。

第二集群人數最少，占受訪選民的 13.0%。該集群選民幾乎是清一色的本省籍選民所組成（本省籍選民占 96.4%），在族群意識上自認為「台灣人」，在統獨立場上主張「台灣獨立」，政黨評價上對國民黨和新黨傾向給予負面評價，對民進黨則給予正面評價；政黨喜惡上喜歡民進黨而不喜歡國民黨及新黨；政黨印象上，對民進黨抱持正面印象而對國民黨及新黨抱持負面印象。上述的集群成分屬性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75.2% 投票給民進黨，15.6% 投給國民黨，7.3% 投給其他黨籍或無黨籍，只有 1.8% 投給新黨，顯示該集群是民進黨核心支持選民，是屬於民進黨選民集群。

第三集群的人數次多，占受訪選民的 20.8%。該集群選民的省籍結構與台灣社會相接近（本省籍占 77.8%，外省籍占 22.2%），族群意識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向「中國人」方向傾斜，統獨立場傾向「主張統一」，政黨評價對

民進黨和新黨給予負面評價，對國民黨則給予正面評價；政黨喜惡喜歡國民黨而不喜歡民進黨和新黨，且不喜歡民進黨的程度甚於新黨；政黨印象對國民黨抱持正面的印象，而對民進黨及新黨抱持負面印象，且對民進黨抱持負面印象甚於新黨。該集群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84.8% 投給國民黨，10.5% 投給民進黨，2.6% 投給新黨，2.1% 投給其他黨籍或無黨籍，顯示該集群是國民黨核心支持選民所在，屬於國民黨選民集群。

第四集群人數占受訪選民的 13.4%。該集群選民本省籍與外省籍各占一半，族群意識傾向自認為「中國人」，統獨立場主張「兩岸統一」，政黨評價給予新黨正面的評價，而給予國民黨及民進黨負面評價，並給予民進黨最負面的評價；在政黨的喜惡及印象上，對新黨則表現出正面的偏好，而對國民黨和民進黨表現出負面的觀感，並且對民進黨的負面觀感甚於對國民黨。該集群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60.0% 投票給新黨，30.5% 投給國民黨，6.3% 投給民進黨，3.2% 投給其他黨籍或無黨籍，顯示該集群選民是新黨的核心支持選民，屬於新黨選民集群。

表 3-12：四個選民集群之黨派投票行為交叉分析（1995 年立委選舉）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	合計
<b>游離選民集群</b>					
次數	176	109	11	15	311
橫列百分比	56.6 %	35.0 %	3.5 %	4.8 %	100.0 %
直行百分比	45.8 %	50.2 %	14.7 %	50.0 %	44.1 %
<b>民進黨選民集群</b>					
次數	17	82	2	8	109
橫列百分比	15.6 %	75.2 %	1.8 %	7.3 %	100.0 %
直行百分比	4.4 %	37.8 %	2.7 %	26.7 %	15.4 %
<b>國民黨選民集群</b>					
次數	162	20	5	4	191
橫列百分比	84.8 %	10.5 %	2.6 %	2.1 %	100.0 %
直行百分比	42.2 %	9.2 %	6.7 %	13.3 %	27.1 %
<b>新黨選民集群</b>					
次數	29	6	57	3	96
橫列百分比	30.5 %	6.3 %	60.0 %	3.2 %	100.0 %
直行百分比	7.6 %	2.8 %	76.0 %	10.0 %	13.5 %
<b>合計</b>					
次數	384	217	75	30	706
橫列百分比	54.4 %	30.7 %	10.6 %	4.2 %	100.0 %
直行百分比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卡方值 = 352.54 df=9 p = .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選舉行為與台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研究：從八十四年立委選舉探討。

根據表 3-12 的交叉分析顯示各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國民黨的選票有 45.8% 來自游離選民集群、42.2% 來自國民黨選民集群，顯現出國民黨是以游離選民和國民黨認同選民作為主要的選票來源；民進黨的選票有 50.2% 來自游離選民集群、37.8% 來自民進黨選民集群，顯現出民進黨是以游離選民和民進黨認同選民做為主要票源；新黨的選票有 76.0% 來自新黨選民集群，有 14.7% 來自游離選民集群，顯現出新黨是以新黨認同選民作為主要票源。

相對地，國民黨從民進黨選民、新黨選民集群所獲得的選票相當有限，兩者合計只有一成二%；民進黨從國民黨選民集群、新黨選民集群，以及新黨從民進黨選民集群、國民黨選民集群，兩者所獲得的選票也都不超過一成五。顯示三黨各有其排他性的核心選民集群，而更加突顯游離選民是國、民黨兩黨票源重疊之處，同時也是新黨除核心選民集群之外的主要選票來源。

因此，李登輝在一九九六年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時，其目標選民的標定自是以國民黨選民集群及游離選民集群為主，特別是處於各變項數值中間位置的游離選民集群，已經充分顯露出其為本土游離選票的特質，因而李登輝跳脫國民黨的政黨框架，直接以個人形象特質及本土化路線主張進行競選策略定位。雖然本土化的路線概念定位可能導致部分具有中國意識的國民黨選民的流失，不過在政黨認同因素的介入下這部分的流失應該有限，而所爭取到的本土游離選票也足以填補這部分流失的選票。

### 三、1998 年立委選舉的選民黨派投票行為

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調查資料，對選民進行集群分析發現選民的省籍、族群意識、統獨立場，以及對國民兩黨的評價、滿意度、印象等九個變項，分別通過變異數分析的 F 值檢定（附錄二），並能有效將受訪選民區隔成四個集群（表 3-13），且不同集群選民具有不同的黨派投票傾向（表 3-14）。<sup>15</sup>這四個選民集群的組成特徵如下：

第一集群的人數最多，占受訪選民人數的 42.8%。該集群的組成清一色為本省籍選民，族群意識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向自認為「台灣人」方向傾斜，統獨立場由「維持現狀」向「主張台灣獨立」傾斜，對國民黨的評價、滿意度、印象，是由「中性」傾向「負面」評價；對民進黨則由「中性」傾向「正面」評價。該集群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有 45.7% 投票給民進黨，33.8% 投給國民黨、16.2% 投給其他黨團、4.3% 投給新黨，屬於游離選民集群。

<sup>15</sup>新黨在一九九八年的立委選舉因黨內的提名分裂與派系衝突情況相當嚴重，引發新黨認同者對新黨的疏離而面臨嚴重泡沫化的危機，反映在選舉結果新黨的得票率為 7.06%，比上屆少了近一半的選票。新黨泡沫化的現象同時也反映在選後的政黨認同調查結果，新黨認同者和支持者的人數百分比顯著降低。為此，關於新黨的評價、印象的測量結果，均無法成為有效區隔選民的變項，但藉由對國、民兩黨的測量變項，仍能有效區隔出對國、民兩黨採負面評價的中國意識選民集群。



第二集群選民數占受訪選民的 13.0%。該集群選民絕大部分是由本省籍選民所組成（本省籍占 95%，外省籍占 5%），族群意識傾向自認為「台灣人」，統獨立場傾向主張「台灣獨立」，對國民黨的評價、表現、印象，都明顯傾向負面評價；對民進黨的評價、表現、印象，則明顯傾向正面評價。因此，該集群選民在政黨認同及相關政策傾向相當符合一般民進黨選民的屬性，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63.5%投票給民進黨、17.6%投給國民黨、15.3%投給其他黨團、僅有 3.5%投給新黨，是為民進黨的核心支持選民，屬於民進黨選民集群。

**表 3-13：一九九八年立委選舉四個選民集群中心的相對位置**

變項	第一集群	第二集群	第三集群	第四集群
省籍	-.369	-.206	.310	1.181
族群意識	-.209	-.320	.260	.832
統獨立場	-.183	-.539	.309	.511
對國民黨的評價	-.195	-.716	.924	.014
對民進黨的評價	.193	1.827	-.436	-.251
對國民黨表現的滿意	.010	-.955	.506	-1.023
對民進黨表現的滿意	.299	.415	-.304	-.908
對國民黨的印象	-.409	-.508	.642	-.611
對民進黨的印象	.209	.910	-.367	-.796
人數	392	120	332	73
百分比	42.8	13.0	36.2	8.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選區環境條件與選民行為：1998 年立委選舉之科際整合研究。

第三集群人數次多，占受訪選民的 36.2%。該集群選民的省籍組成和台灣社會的省籍分布比較為接近（本省籍占 78.0%，外省籍占 22%），族群意識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向自認為「中國人」的方向傾斜，統獨立場由「維持現狀」向「主張統一」方向傾斜，對國民黨的評價、表現、印象，明顯傾向給予正面的評價；對民進黨的評價、表現、印象，則給予明顯傾向負面的評價。該集群選民的政黨認同及相關政策傾向符合一般對國民黨選民的認知，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上，有 73.2%投給國民黨、14.4%投給其他黨團、6.7%投給新黨、5.7%投給民進黨，是國民黨的核心支持選民的所在，屬於國民黨選民集群。

第四集群人數最少，占受訪選民的 8.0%。該集群選民中本省籍和外省籍各占一半，族群意識自認為「中國人」，統獨立場主張「中國統一」，對國民兩黨的評價、表現、印象均傾向「負面」評價。顯然該集群選民並不認同國、民兩黨，對民進黨的負面評價也甚於國民黨，該集群選民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有 49.0%投給國民黨、25.5%投給新黨、17.6%投給民進黨、7.8%投給其他黨籍，該集群選民可稱為具中國意識的游離選民。

表 3-14：四個選民集群之黨派投票行為交叉分析（1998 立委選舉）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其他	合計
游離選民集群					
次數	79	107	10	38	234
橫列百分比	33.8 %	45.7 %	4.3 %	16.2 %	100.0 %
直行百分比	29.0 %	58.8 %	25.0 %	44.7 %	40.4 %
民進黨選民集群					
次數	15	54	3	13	85
橫列百分比	17.6 %	63.5 %	3.5 %	15.3 %	100.0 %
直行百分比	5.5 %	29.7 %	7.5 %	15.3 %	14.7 %
國民黨選民集群					
次數	153	12	14	30	209
橫列百分比	73.2 %	5.7 %	6.7 %	14.4 %	100.0 %
直行百分比	56.3 %	6.6 %	35.0 %	35.3 %	36.1 %
中國意識選民集群					
次數	25	9	13	4	51
橫列百分比	49.0 %	17.6 %	25.5 %	7.8 %	100.0 %
直行百分比	9.2 %	4.9 %	32.5 %	4.7 %	8.8 %
合計					
次數	272	182	40	85	579
橫列百分比	47.0 %	31.4 %	6.9 %	14.7 %	100.0 %
直行百分比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卡方值 = 183.118 df=9 p = .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選區環境條件與選民行為：1998 年立委選舉之科技整合研究。

根據表 3-14 的交叉分析顯示各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國民黨的選票有 56.3% 來自國民黨選民集群，29.0% 來自游離選民集群，兩集群合占國民黨選票的 85.3%。民進黨有 58.8% 來自游離選民集群，29.7% 來自第民進黨選民集群，兩集群合占民進黨選票 88.5%。新黨的選票有 35.0% 來自國民黨選民集群，32.5% 來自中國意識選民集群，兩集群合占新黨選票 67.5%。顯現出游離選民集群依舊是國民兩黨的票源重疊之地，同時也是決定選戰勝負的兵家必爭之地。因此，就連戰參選前所面臨的選民結構而言，其目標選民的標定仍與李登輝相同，應以國民黨選民和游離選民為主要目標選民。

### 參、小結

國內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研究發現投票成本，是導致國內選民不去投票的主要原因，居次是對政治失望所導致的疏離感，且教育程度越高者有越高比率以此作為不投票行為的理由，最後則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欠缺相關資訊。其次，國

內不投票選民的主要人口特徵為，29 歲以下、大學以上學歷、學生、社會涉入程度低（未婚、遷移人口、未參加社團）；相對地，50 歲以上、小學及以下學歷、社會涉入程度深（已婚、世居當地、有參加社團），則能明顯降低或抑制不投票的機率。<sup>16</sup>最後，國內不投票選民的主要政治心理態度為，對政黨沒有認同、對政治沒有興趣；相對地，對政黨認同度高、對政治感到興趣，則能明顯降低或抑制不投票的機率。

這些研究發現都建立在九〇年代多次國內選民投票行為的調查研究，顯示台灣選民不投票行為的研究發現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因此，在選民投票參與行為的選民因素上，李登輝和連戰所面對的選民投票參與行為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性存在。另外，不投票選民的政治態度傾向與游離選民有相當高的重疊性，例如沒有特定的政黨認同取向，並且對政治參與的興趣也不高，顯示游離選民的投票意願可能偏低，候選人如何喚起他們的參與感進入投票所投票，將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其次，省籍、統獨立場、政黨認同等變項，是有效區隔選民黨派投票行為的變項，九〇年代三次立委選舉的選民集群分析發現，各集群選民的人數分布比率相當穩定。游離選民集群的人數最多，約占選民數的四成三；其次是國民黨選民集群，約占選民數的三成；第三是民進黨選民集群，約占選民數的一成五；最後是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約占選民數的一成。這樣的選民集群分布反映出國民黨的政黨實力最大，選舉時若非國民黨發生內部提名分裂的情況，且民進黨推出有形象相當好的候選人，否則國民黨總是占有選舉優勢。

雖然國民黨相較於民進黨及新黨擁有較大的選民基礎，但是三成的基本盤並不足以確保選戰的勝利，特別是國民黨選民集群的人數比率變化較大，若以一九九二年作為比較的基準點，對照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八年各集群的人數比率，顯示有相當的國民黨選民和游離選民，是在這兩次選舉間相互流動轉換其集群歸類的，突顯出國民黨選民的政黨認同強度不強而容易轉入游離選民行列。

表 3-15：九〇年代台灣選民集群分佈結構

年度	游離 選民集群	民進黨 選民集群	國民黨 選民集群	新黨（中國意 識）選民集群
一九九二年	35.2%	17.1%	33.3%	14.4%
一九九五年	52.8%	13.0%	20.8%	13.4%
一九九八年	42.8%	13.0%	36.2%	8.0%
<b>平均</b>	<b>43.6%</b>	<b>14.4%</b>	<b>30.1%</b>	<b>11.9%</b>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立委選舉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sup>16</sup>其中 50 歲以上、小學及以下學歷者、社會涉入程度深的選民，若佐之農業縣分的投票率明顯高於都會縣市的結果。顯示這些選民可能是地方派系透過農漁會系統進行選舉動員的對象，致使在調查資料中顯示其投票率明顯偏高的現象。

最後，上述選民集群分布結構形成主要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表 3-16），在新國民黨連線正式組成新黨之後，國民黨的選票組成是以國民黨選民集群和游離選民集群為主；民進黨是以民進黨選民集群和游離選民集群為主；新黨是以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為主。不過，具中國意識的新黨選民集群，其黨派投票傾向在新黨和國民黨之間移轉性很高，不像民進黨選民集群對民進黨的忠誠。為數最多的游離選民，雖然在政黨傾向上沒有明顯的偏好，但是在省籍、族群意識和統獨立場傾向本土色彩，同時相對於國民黨選民集群和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游離選民集群對民進黨的評價也較為友善和正面，其黨派投票傾向主要以國民黨和民進黨作為支持對象。

表 3-16：九〇年代主要政黨的選票組成結構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1992	1995	1998	1992	1995	1998	1992	1995	1998
游離選民集群	23.5%	45.8%	29.0%	34.3%	50.2%	58.8%	32.9%	14.7%	25.0%
民進黨選民集群	2.7%	4.4%	5.5%	58.6%	37.8%	29.7%	4.1%	2.7%	7.5%
國民黨選民集群	50.1%	42.2%	56.3%	6.6%	9.2%	6.6%	30.1%	6.7%	35.0%
新黨選民集群	23.7%	7.6%	9.2%	0.5%	2.8%	4.9%	32.9%	76.0%	32.5%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歷年立委選舉面訪資料（研究計劃名稱請參閱研究調查資料來源表）。

根據上述選民集群和黨派投票行為的分析比較結果，顯示李登輝與連戰在選前的面臨的選民因素是相近似的，連戰所面對的選民因素甚至還比李登輝還有利一些，新黨的泡沫化現象確實讓新黨（中國意識）選民游移在國民黨和新黨之間。而民進黨選民集群與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不論在省籍組成、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均分處光譜的兩個極端，反映在兩集群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上，民進黨選民集群絕少支持新黨的候選人，新黨（中國意識）集群選民則絕少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顯示兩集群選民政治態度的對立與黨派投票行為的分歧。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游離選民集群在省籍、族群意識、統獨立場、對政黨的評價等，與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的對立程度，僅次於民進黨選民集群與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的對立程度，而反映在黨派投票行為是以國民黨和民進黨候選人為主要支持對象。

### 第三節 李、連競選策略的比較

從九〇年代的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的分析比較發現，國民黨擁有選舉競爭的「主場優勢」，而國內各主要政黨的議題相對位置、選民投票參與行為、區隔選民的有效變項、選民的集群分佈狀況，以及選民黨派投票行為，都維持相當的穩定性。因此，連戰在參選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時，不僅同樣面臨黨內重要人士脫黨競選，形成三組主要總統候選人競逐的「三爭一」競爭模式，也同樣面對李登輝參選時相近似的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

不過，同為執政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李登輝和連戰，在實際競選過程卻顯現出對選局的不同認知和評估，進而採取不同的候選人概念定位，標定出不同的目標選民範圍，並表現出不同的競選策略選擇。顯然，李登輝和連戰不同的競選行為策略選擇，並非因環境系絡因素或選民因素的變化所造成的，主要是受到候選人因素的影響。連戰在人格特質、施政風格、意識型態、議題立場，皆有著與李登輝不同的差異性存在，形塑了連戰不同於李登輝的候選人概念，及目標選民範圍的標定，而衍生出不同的競選行為表現。

#### 壹、李登輝的自我概念定位、目標選民與策略選擇

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由副總統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並逐步貫徹本土化路線引發國民黨內非主流勢力的強烈反彈，其間造成一九九三年新國民黨連線出走組成新黨，最後導致一九九六年林洋港、郝伯村、陳履安等非主流人士脫黨與其競選總統一職。因此，對國民黨內流派鬥爭而言，一九九六年的總統選舉是主流和非主流領導人的直接對壘，是為長期以來黨內的路線爭議訴諸最後的民意公決。因此，李登輝給民眾一般的公眾形象內容，是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具有濃厚的本土意識，具有相當的領袖魅力和親和力。

為此，一九九六年李連競選總部企劃部的競選策略報告書，曾對李登輝的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內容，根據目標選民的不同屬性而提出以下的六點建議：

1. 針對既有的支持選民，李總統應繼續維持下列形象：台灣人的總統、同體感、親和力、領導力。
2. 針對政黨認同中立者、傾民進黨者，李總統應塑造下列形象：台灣尊嚴的代表、生命共同體的保護者、理性和平。
3. 針對支持度較弱的選民，李總統應補強下列形象：親和力、建設力、了解民眾的需要、領導力。
4. 著重穩健的柔性訴求，主打政績與正面形象，並塑造全民共同愛這塊土地、族群融合的柔性號召。

5. 將李登輝的形象塑造超越國民黨的框架，大量吸取本省籍選票。
6. 選戰後期，以喚起選民危機意識，將李執政與政治安定串連，伺機促成「棄彭保李」形勢。

李登輝陣營在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和競選策略的選擇，仍延續執政黨在統獨和安改議題的優勢地位，但更加強化李登輝個人特質與一貫的本土化路線，即使在中共導彈演習的威脅下，以李登輝作為台灣人總統、確保台灣主體性、強調台灣優先的競選軸線，仍然明確地貫穿競選全部過程。同時結合李登輝深具領袖魅力的人格特質，從國民黨選民集群出發積極爭取游離選民集群的支持，並未將新黨（中國意識）選民納入目標選民範圍。特別是一九九六年中共的導彈演習及對李登輝的文宣批鬥，益發突顯李登輝認同本土、強調台灣意識、力鬥非主流的林郝且無懼於中共的威脅，更形確立李登輝作為台灣人總統的形象。

表 3-17：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政黨認同與投票支持對象交叉表

		陳履安	李登輝	彭明敏	林洋港	未表態	合計
傾國民黨	次數	14	446	3	19	72	554
	橫列百分比	2.5	80.5	.5	3.4	13.0	100.0
	直行百分比	18.9	65.6	2.3	19.8	23.9	43.2
傾民進黨	次數	12	55	109	7	34	217
	橫列百分比	5.5	25.3	50.2	3.2	15.7	100.0
	直行百分比	16.2	8.1	82.6	7.3	11.3	16.9
傾新黨	次數	24	10	1	60	23	118
	橫列百分比	20.3	8.5	.8	50.8	19.5	100.0
	直行百分比	32.4	1.5	.8	62.5	7.6	9.2
中立 無反應	次數	24	169	19	10	172	394
	橫列百分比	6.1	42.9	4.8	2.5	43.7	100.0
	直行百分比	32.4	24.9	14.4	10.4	57.1	30.7
合計	次數	74	680	132	96	30.1	1283
	橫列百分比	5.8	53.0	10.3	7.5	23.5	100.0
	直行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Likelihood Ratio=776.242, df=12, p=.000

資料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1996年總統選舉選民投票行為之科際整合研究。

換言之，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李登輝候選人概念和定位，確實因候選人因素而超越了既有的政黨框架和選票結構，表 3-17 是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選民政黨認同與投票行為的交叉分析，顯現李登輝的選票組成有 65.6% 來自國民黨的認同者，來自無政黨認同者及民進黨認同者各占二成五，而來自新黨認同者只占 1.5%；相對地，林洋港和陳履安則瓜分了新黨的絕大部分選票。顯示李登輝 54% 的選票確實有相當部分是來自本土游離選民，以及民進黨支持者的跨黨轉向支

持，而新黨支持者確實是李登輝最難以爭取的。

顯然，在正確掌握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之下，從候選人因素出發到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目標選民的標定及競選策略的執行，其間邏輯連貫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讓李登輝成功爭取了本土游離選民和部分民進黨選民的支持，而獲得過半數選票。然而，連戰參選的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內部卻出現競選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

## 貳、連戰的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以及策略選擇

自一九九三年趙少康等新國民黨連線成員脫離國民黨組成新黨以來，在九〇年代的多項行政首長公職選舉，國民黨就多次面臨民進黨和新黨分別推出候選人的「三爭一競爭模式」，在此同時「棄保」的傳聞與候選人「棄保策略」的操作也成為選戰的新聞焦點，而選民的「分裂投票行為」及「策略投票行為」也成為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焦點。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三爭一」選戰有三：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以及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在這三場「三爭一」選戰，整體戰績為二勝一負。這三場選戰的勝負經驗對國民黨二〇〇〇年總統選戰的競選策略選擇有著深遠的影響。

就二〇〇〇年總統選戰國民黨陣營的策略選擇而言，一方面是要避免重蹈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的敗選覆轍，不要讓「連宋分裂」成為民進黨陳水扁漁翁得利的機會；若「連宋分裂」已成定局，面對連宋陳「三爭一」的競爭模式，則是要複製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的李登輝模式，還是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選舉的馬英九模式。顯然，在宋楚瑜民調支持度居高不下，宣布脫黨參選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國民黨面臨的問題僅剩下是要複製李登輝經驗模式（以國民黨選票為基礎，爭取本土游離選票），還是馬英九經驗模式（以國民黨選票為基礎，爭取新黨選票）。

但對這個問題國民黨內部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和主張，首先「李登輝經驗模式」與「馬英九經驗模式」，雖然都是以國民黨選民集群為基礎，但兩者不論在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及競選策略選擇都有相當大的差異性存在，並具體反映在李、馬兩人選票組成的差異，李、馬的選票各自包含了族群意識和統獨立場極端對立的民進黨選民和新黨選民，並讓民進黨的彭謝和新黨的王建煊分別因李、馬票源的擠壓，各自創了所屬政黨歷來的最低得票記錄。

因此，國民黨內主張複製「李登輝經驗模式」者認為，連戰身為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接班人，候選人概念定位和競選策略選擇應該延續李登輝的模式，過去林郝、陳王的 25%選票應該算入外省籍獨立參選人宋楚瑜的基本盤，是國民黨和連戰難以爭取的選民，不應列入連戰的目標選民範圍。因而李系人士大都主張選戰的軸線應以連宋的國家定位對決為核心積極爭取本土游離選票，在策略上一如李登輝善待民進黨彭明敏一般，連戰應懷柔並邊緣化民進黨陳水扁，讓不願

見「親中傾統」的宋楚瑜當選的民進黨選民，在最後連宋對決之下作出「棄陳保連」的策略投票決定。

相對地，國民黨內主張複製「馬英九經驗」者認為，從候選人因素來看連戰本人不同於李登輝，連戰並不涉入國民黨過去的流派鬥爭，非主流大老對連戰的接受度要比宋楚瑜來得高，新黨選民對連戰並不排斥。再者，連戰本省世家與大陸出生的背景，讓連戰具有整合八〇年代傳統國民黨選票的條件。特別是在兩岸議題上，台獨的陳水扁是「大陸不放心」；外省籍的宋楚瑜則是「台灣人不放心」，只有本省世家、大陸出生，行政經驗豐富的連戰可能有所作為。因而連系人士大都主張選舉的軸線應以連陳的政黨統獨對決為核心，強打「恐獨安定牌」而懷柔並邊緣化宋楚瑜，讓具有強烈反台獨意識的新黨選民因不願見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當選而作出「棄宋保連」的策略投票決定。

不言自明，這兩條不同的選舉軸線主張是和國民黨內既有省籍和意識型態分歧相重疊的。李系人士在省籍背景、國家定位、情感與人脈關係，大都與陳水扁陣營人士相近，其中本土色彩濃厚的長榮集團在一九八九年資助成立的國內第一所民間智庫－國策中心，即是李登輝與陳水扁在政學界人脈關係的主要交集所在。因此，複製李登輝經驗、連宋對決、懷柔陳水扁，對李系人士的意識型態和情感是最沒衝突和負擔的。<sup>17</sup>

雖然，根據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的分析，這兩條選戰軸線主張各有所本，並且也各有成功的經驗範例，李、馬雖以國民黨選民為核心，但其拓展選票的目標對象則是分處政治光譜的相反方向，是有其內在根本性衝突存在。顯然，李登輝和馬英九模式的成功，不同的候選人因素發揮了相當關鍵的影響作用。然而，這兩條具有內在矛盾的軸線主張卻在「分進合擊，極大化選票」的假設前提下，結合連戰「溫和居中」的候選人形象，強調連戰「有容乃大」的人格特質，以及「豐富」的行政經歷，連戰陣營最後遂以跨族群及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適國家領導人作為連戰的候選人概念定位（李建榮，1998：492-94）。

為此，連戰陣營在目標選民的標定是以國民黨選民為核心，既爭取本土游離選民也爭取新黨選民，衍生出對宋楚瑜和陳水扁進行左右開弓的兩邊作戰策略。在上述選舉策略的選定下，國民黨一方面由李登輝一派複製李登輝競選策略，沿著國家認同的兩岸關係定位軸線來主打宋楚瑜、懷柔陳水扁；另一方面則由連戰一系複製馬英九競選策略，沿著統獨的政黨對決軸線來主打陳水扁、懷柔宋楚瑜。這樣的策略主張並具體反映在國民黨中央和競選總部的輔選行程和分工的安排，由李登輝主席主跑南部縣市的輔選行程，攻擊宋楚瑜「A錢」與「親中」，爭取本土游離選票對連戰的支持，連戰則攻擊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陳水扁，強打「恐

---

<sup>17</sup>當時的參與觀察發現在選戰後期選局渾沌不明時，李系人士浮現的氣氛是連戰若能當選最好，否則陳水扁當選還可接受，但宋楚瑜當選則是令人無法接受的；連系人士認為連戰若能當選最好，否則宋楚瑜當選還可接受，但陳水扁當選則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獨安定牌」指陳水扁當選將引發中共武力犯台，另外積極爭取非主流大老的站台支持，安排蔣家家屬前往眷村拉票，並發表蔣宋美齡支持連戰的公開信，拉攏新黨選票。

這樣的策略組合和輔選行程的分工和安排似乎相當合理且完美，但卻忽略了現今大眾傳播媒體發達，任何的輔選活動訊息是全國選民同步接收的現實。換言之，當李登輝以連戰是其本土化路線的繼承者向本土游離選民訴求時，新黨選民也獲知同樣的訊息，並且可能解讀成「連戰沒主見，只不過是李登輝的傀儡」；當反李登輝的蔣方智怡替連戰在眷村拉票，以及連戰核心幕僚弄來蔣宋美齡的公開信，並大打「恐獨安定牌」時，本土游離選民也同樣看在眼里，解讀的結果可能是「親中的連戰結合外省非主流勢力在逼李登輝的宮」。<sup>18</sup>

顯然，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內主流和非主流之間夾雜路線與權力鬥爭的矛盾，在即將邁入後李登輝時期的此刻都匯集到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身上。連戰作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不但沒有整合過去黨內的流派路線鬥爭，以正反合的辯證過程突顯出路線整合後的主體性，反而淪為主流和非主流路線各自表述的場域或載體。因此，分進合擊的策略極可能讓本土游離選民和新黨選民對連戰產生認知的衝突和混淆而心生疑慮，同時也讓對手能在李連關係上大做文章，以見縫插針遇洞灌水的方式來分裂國民黨陣營。

## 參、小結

比較李、連的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及目標選民的選定，而衍生的不同競選策略選擇，其間候選人因素相較於環境系絡因素及選民因素，顯然扮演了相當關鍵的影響作用。就如李、馬經驗模式的差異一般，李登輝無法採用馬英九模式，而馬英九也無法複製李登輝經驗，都是因為候選人因素使然。關於李登輝和連戰候選人因素的差異，衍生出李、連的候選人概念定位及競選策略的不同，可從連戰陣營相當借重楊力宇教授，他對李登輝和連戰在人格特質、施政風格、議題立場的分析比較內容獲得一個較為清楚的印象（楊力宇，2000：220-22）：

- 1.李登輝為一草根性的政治家，本土氣息極濃；連戰則為一學者型政治人物，具本土情懷與西方政治家的風度。
- 2.李登輝行事比較激烈，有時甚至非常激進，姿態甚高，強勢領導，不惜對抗；連戰卻是比較溫和、理性而務實，謹言慎行，強調溝通、協調與合作，但對錯誤的政策則反對到底。

<sup>18</sup> 其間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競選行為矛盾場景，就在三一八投票前夕在板橋體育場的造勢晚會上，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對壘過的李登輝和陳履安先後替連戰站台助講，並透過現場一排攝影機的鏡頭要他們各自的認同者投票支持連戰。但陳履安稍早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挺連記者會，才公開呼籲李登輝應該即刻辭去黨主席，並表示這樣對連戰的勝選才有幫助，引發李系人士的嚴重不滿。而當台上李登輝大聲疾呼，提醒本土選民不要被「賣台」的宋楚瑜給騙了，到時台灣怎麼被賣了都還不知道，但接著上台的陳履安則強調連戰不談李登輝的「兩國論」，連戰談「一個中國」、「國統綱領」將為台灣帶來和平，而民進黨陳水扁的「台獨主張」將會台灣帶來災難

- 3.李為一強勢政治人物，有其強烈的個性及堅持，與先後曾合作過的人士如林洋港、陳履安、郝伯村、宋楚瑜等均決裂或分道揚鑣。李登輝有定見，有強烈的使命感，有作為領袖所需的「霸氣」；連戰同樣有強烈的使命感，對原則亦極堅持，但比較理性，即使不能與對方合作，仍能維持一定的尊重，對不同的意見及行事作風亦多尊重，故亦常贏得反對者的尊敬。
- 4.在兩岸政策上，李、連均堅持國家安全、兩岸對等及堅拒一國兩制等重大原則。但李登輝用詞強烈，予人有意向中共挑釁之感，而連戰卻語句溫和，立場堅定，強調雙贏。
- 5.行事風格上，李登輝為一恩怨分明的政治人物，有仇必報，有恩必答，具江湖義氣，甚至武士道精神；連戰則是仁人君子，有容乃大，待人寬厚，容忍異己，謙虛自治，待人以禮，並多尊重，為人泱泱大度，氣度恢宏，頗具民主風度及自由主義精神。

因此，相對於李登輝愛恨分明的處世風格，及堅定本土化路線而不惜引發一波波的黨內流派鬥爭，並與中共直接對抗交鋒捍衛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灣人總統概念定位。連戰陣營基於連戰個人「溫和」、「中庸」、「敦厚」、「理性」的人格特質，以及認為兩岸經貿利益日趨緊密選民需要的理想國家領導人，應該不是像李登輝一般帶頭對抗中共，而是有能力和平處理兩岸關係的判斷，再結合上連戰豐富的行政歷練與視野，遂以跨族群穩健的國家領導人概念為連戰進行候選人定位，目標選民的標定範圍要比李登輝還來得廣，連戰陣營既要與宋楚瑜競爭新黨選民，又要同時與陳水扁競爭本土游離選民。為此，連戰陣營既要延續李登輝本土化路線下，又要積極向非主流大老示好，連戰陣營欲置冰炭於一爐的結果，反而衍生出相互衝突的競選行為。

## 第四節 結語

根據九〇年代選舉的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的審視，顯示兩岸關係和台灣內部省籍分歧互動所衍生的國家認同、統獨立場、安改立場及政黨認同分歧，明顯影響著台灣選民的黨派投票行為傾向。雖然，基於兩岸長期分離、分治的事實，絕大多數台灣選民在國家認同都有清楚的台灣認同，但是對岸中共的長期武力威脅也讓台灣社會充滿危機意識，維持兩岸現狀和強調社會安定是台灣民意的主流。這樣的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讓執政的國民黨享有「主場優勢」，能在民主化之後的全面選舉競爭贏得多數民意支持而得以繼續執政，同時也促使民進黨正視台獨黨綱所造成的選舉障礙而展開台獨論述的轉化。

雖然，台灣選民眼中的民進黨變得越來越務實，與主流民意的差距越來越小，但是這只是「量變」過程還不到「質變」的結果，選民眼中的國民黨仍是最靠近主流民意的政黨，國民黨仍具有最多選民認同的政黨。因而民進黨直到一九九九年仍必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來降低選民對台獨主張的疑慮。因此，連戰參選時所面臨的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與李登輝參選時所面對的並無明顯的差異。但是，比較李、連競選時的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內容及相關的競選策略選擇，卻顯示出彼此間相當的歧異性存在，顯現出候選人因素對候選人概念定位、目標選民範圍及競選策略選擇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李登輝繼任蔣經國而成爲第一位台灣人總統，並且在主導台灣民主化過程逐步落實統治權力結構的本土化，引發國民黨內夾雜權力和路線主張的激烈流派鬥爭，李登輝不時援引社會民意或民進黨爲後援，迫使黨內非主流人士一一出走組成新黨。因而，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李登輝陣營自始認爲新黨選民是反李選民而不將其納爲目標選民。相對地，李登輝的接班人連戰因其不沾鍋的性格，自始就避免捲入黨內的流派鬥爭，雖然連戰是李登輝選定的接班人，但仍與非主流人士保持不錯的個人關係，連戰因流派色彩不明顯而成爲主流和非主流人士所能共同接受的人物。因而，二〇〇〇年總統選舉連戰陣營自始認爲，新黨選民是反李不反連，在極大化選票的策略目標下應將新黨選民納爲目標選民，並積極爭取新黨選民的支持。

兩相比較之下，突顯候選人因素對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的關鍵性影響，李、連即使面對相似的環境系絡因素和選民因素，但因候選人因素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候選人概念定位，顯現出不同的競選策略選擇及目標選民的選定。然而，根據政治行銷理論關係行銷典範的論點，連戰的候選人自我概念定位雖然符合他給人溫和中庸的一般公眾形象，但是他目標選民的標定範圍卻可能犯了過度追逐性策略的錯誤。因爲從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及一九九八年三次立委選舉的選民集群分析發現，游離選民集群幾乎是清一色的本省籍選民，在統獨立場是中間傾獨，

並對民進黨有相對好感，黨派投票行為是游離在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只有少部分投給新黨。相對地，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有半數以上的外省籍選民，在統獨立場是主張統一，對民進黨則抱持最負面的評價，黨派投票行為游離在新黨和國民黨之間，但絕少投票支持民進黨。

顯然游離選民和新黨（中國意識）選民集群，兩者在省籍組成及政治偏好都有明顯的分歧，連戰陣營若積極向非主流大老及新黨選民示好，可能引發游離選民對連戰背離李登輝本土路線的疑慮；同樣地，連戰呼應李登輝的兩國論爭取游離選民的支持，也可能引起新黨（中國意識）選民質疑連戰沒主見只是李登輝操控的傀儡。因此，連戰陣營分進合擊的極大化選票策略，反而沒辦法同時獲得游離選民和新黨（中國意識）選民的信任，而降低兩集群選民投票給連戰的可能性。<sup>19</sup>

---

<sup>19</sup> 在總統選後國民黨文工會的檢討會議中，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鄭自隆稱此一現象為「蝙蝠效應」，蝙蝠事實上是屬於會飛的哺乳類動物，但是其他不會飛的哺乳類動物視會飛的蝙蝠為鳥禽類動物，而一般鳥禽類動物則視沒羽毛會哺乳的蝙蝠為哺乳類動物，其結果是哺乳類和鳥禽類動物均視會飛的哺乳類動物蝙蝠為非我族類。